

文史知识

学习古典诗歌漫谈

从文学角度看《左传》

东林书院和东林党

《水浒传》与《荡寇志》

公孙大娘《剑器舞》的来龙去脉

八十年来对《水浒》作者的争议

空军军医学校

图书资料

政治教研室

廖仲安

沈玉成

瞿林东

徐公持

王克芬

黄倣成

11

1984

WENSHI ZHISHI



医药学院610 2 01495781

文史知识

1984年第11期

(总第41期)

-
- | | | |
|-------------------|-----|---|
| • 治学之道 • 学习古典诗歌漫谈 | 廖仲安 | 3 |
|-------------------|-----|---|
-
- | | | |
|----------------------|-----|----|
| • 文学史百题 • 从文学角度看《左传》 | 沈玉成 | 9 |
| • 历史百题 • 东林书院和东林党 | 瞿林东 | 14 |
-
- | | | |
|---------------------|-----|----|
| • 怎样读 • 《水浒传》与《荡寇志》 | 徐公持 | 21 |
|---------------------|-----|----|
-
- | | | | |
|------------------|--------------------------|-----|----|
| 诗
文
欣
赏 | 漫谈“诗眼”和“词眼”(怎样欣赏古典诗词之十五) | 陈志明 | 28 |
| | 意与境会 妙合自然 ——陶渊明《饮酒》之五欣赏 | 李文初 | 33 |
| | 愤激的呼喊——浅析陈子昂《登幽州台歌》 | 袁行霈 | 36 |
| | 诗中有画情更深——读韦应物《滁州西涧》 | 胡经之 | 39 |
-
- | | | |
|---------------|-----|----|
| • 词学名词解释(6) • | | |
| 变、徧、遍、片、段、叠 | 施蛰存 | 42 |
-
- | | | |
|---------------------|--------|----|
| • 文史书目答问 • | | |
| 我国第一部系统的语法学专著《马氏文通》 | 俞敏 谢纪锋 | 44 |
-
- | | | |
|------------------|-----|----|
| • 文史工具书介绍 • | | |
| 收字最多 规模宏大的韵书《集韵》 | 路萌怡 | 49 |
-
- | | | |
|---------------------|-----|----|
| • 古文字学十二讲 • 第二讲 形音义 | 李学勤 | 55 |
|---------------------|-----|----|
-
- | | | | |
|---------------|----------------|--------|----|
| 文化
史
知识 | 关于古小说中提到的蒙汗药 | 朱晟 郭正谊 | 59 |
| | 公孙大娘《剑器舞》的来龙去脉 | 王克芬 | 62 |
| | 太平天国的丧礼改革 | 李文海 | 67 |
-
- | | | |
|--------------------|-----|----|
| • 中国历代官制讲座(连载十一) • | | |
| 郡县乡官——西汉职官之四 | 孙 钺 | 71 |
-

扬州和古代印刷术	许力以	77
----------	-----	----

{人物春秋}	改革家管仲	夏子贤	81
	宋代古文大师欧阳修	胡士明	87
	杨慎二、三事	李恩普	93

{成语典故}	宁为鸡口 无为牛后	郭仲秋	98
	孤注一掷	邸 村	99

汉民族的形成和发展	朱绍侯	100
-----------	-----	-----

• 读书札记 •

人生七十古来稀——谈唐代诗人的寿命	沈松泉	105
-------------------	-----	-----

{语言知识}	每况愈下与每下愈况	郭庆山	107
	“东南西北”字源商榷	程德祺	109

• 青年园地 • 试谈王维山水、景物诗中的绘画美

北京市职工业余大学学生	王秋生	111
-------------	-----	-----

• 名画欣赏 • 陈洪绶和他的《屈子行吟图》	黄远林	115
------------------------	-----	-----

• 文史信箱 • 酒在我国是何时起源的	袁庭栋	117
---------------------	-----	-----

• 文史研究动态 •

八十年来对《水浒》作者的争议	黄椒成	123
----------------	-----	-----

郑重启事	本刊编辑部	8
------	-------	---

• 补白 6 则 • 玺 印 (27) 符 节 (32) 孔雀爱尾 (54) 孟子 自责 (76) 颊上添毫 (104) 囊漏贮中 (110) 阴 阳学台 (122)		
---	--	--

《屈子行吟图》(封二) 垓下遗址、陈胜墓(封三)		
--------------------------	--	--

学习古典诗歌漫谈

廖仲安

廖仲安，生于1925年11月，四川西昌人。现任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中国古典文学教研室主任。主要论著有《谈杜诗》、《唐代文学艺术繁荣的政治思想背景》、《中国诗歌史》、《陶渊明》等。



我最初对古典诗歌发生兴趣是很偶然的。

记得在初中二年级时，我们国文老师朗诵一篇节选自《老残游记》的课文，念到谢灵运的两句诗：“明月照积雪，北风劲且哀。”就情不自禁地连声叫“好”！把课文讲完后，他就异想天开地出了一道作文题：《记我军于“明月照积雪”之夜大破日寇》，当时虽是抗日战争时期，但我们家乡却是四川西南一个偏僻的小县，距离前线几千里，我们根本不知战争是怎么回事。但是我居然在这个题目下写成了一首五言诗，约有十几句。只记得开头两句是：“明月照关山，积雪布冈峦。”下文记不起了。我印象最深的是由于写了这首诗，我的作文就骤然从平时七十分左右上升到了八十五分，老师批语还称赞我的诗写得“悲壮淋漓”。自此之后，我就努力背诵诗词，学作诗词。最初觉得押韵很难，后来在家里找到一部《诗韵集成》，发现每个同韵字下都罗列了许多常用词和例句。得到这个宝贝后，我就感到押韵并不难了，我写诗的兴趣就更大了。

此后，到高中毕业，连换三位国文老师，都是喜欢诗词的。他们除讲课本上的诗词而外，往往还随意选讲一些他们所喜欢的诗词。有时还把他们自己引为得意的作品也写给我们。我们班上有三四位对诗

词有兴趣的同学，也自发地结成诗友。我们把各人家里的诗集诗话都带来，互相传阅。《唐诗三百首》、《古诗源》、《陶渊明集》、《明清诗选》、《渔洋山人精华录》、《渔洋诗话》、《随园诗话》、《白香词谱》等，约有十几种。高中三年里，除课堂听课以及按规定必交的英、数、理、化作业不敢怠慢而外，其余课外时间都用于诗。诗友相见，或比赛背诗，或交谈读诗的趣闻与心得，或拿出自己的诗词习作请诗友们评改。这样到高中毕业时，我们这几个诗友，每人大约能背三四百首诗词（以唐诗为主，也有宋诗、明清诗），每人习作的诗词约有几十首，而且我们所写的五七言律诗绝句的平仄、用韵都基本合格了。

正象批评家不必兼搞创作一样，研究古典诗歌、古典文学的同志们，今天也大可不必再仿效古人“吟诗作赋北窗里”了。而且写诗词是很难学好的。不过，我也不把中学时期作诗填词当作“走弯路”来看，亲自尝过作诗填词的艰难，审度过声调的平仄抗坠，权衡过对仗的巧拙优劣，对我自己辨别诗歌体式，比较诗歌风格，领会诗歌创作的经验，总是有益的。例如读到孟郊的“种稻耕白水，负薪斫青山。”，“借车载家具，家具少于车”，我就能够辨别它和白居易的平易顺畅的诗风的区别，虽然他用的是最平常的字，但诗的风格却是奇巧刻深的，是经过苦吟的。

不过，研究古典诗歌的人，即使不会作诗填词，也最好是养成喜爱诗词的兴味，能辨别什么是诗，什么不是诗。医书的汤头歌诀有韵不是诗，快板有韵又有一定的生动性，趣味性，也不同于我们所说的诗味。严沧浪说：“诗有别裁，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我们应该在诗里看见人，看见生活，看见人的思想和性情，遭遇和感触。自称“竟病之学，幼即不好”的隋唐史专家岑仲勉先生，把唐诗当作史料来研究，围绕着《全唐诗》等唐诗总集别集写了不少论著及工具书。很值得研究唐诗的人参考借鉴。但史学家的著作究竟不能代替我们从文学、文学史角度的研究。因为诗词尽管有史料价值，但是我们总不能只把诗词当史料用。《读杜心解》的作者浦起龙尽管在解释杜诗上流露了不少落后的意识，但他有两句话还是颇深刻的。一曰：“少陵之诗，一人之性情而三朝之事会寄焉者也。”一曰：“史家只载得一时事

迹，诗家直显出一时气运。诗之妙，正在史笔不到处。”懂得这两句话，不仅可以懂得杜甫，而且也就懂得诗与历史现实的微妙、深刻的关系。

要研究古典诗歌的人，应该熟读背诵诗词古文若干篇。诚然，人的记忆能力是有限的，我们研究文学史、诗歌史所要阅读的诗词古文是大量的，我们不可能，也不必要把这些应该阅读的诗词古文完全背诵。但是，熟读背诵相当数量的诗词古文，正是为了帮助我们阅读大量诗词古文的必要条件。我们经常听到一些有名的先辈学者具有惊人的博闻强记的能力，比之这些先辈，我们所能背诵的诗词古文作品实在少得可怜。但我仍然要说，我走上高校古典文学教学岗位后，所以能逐渐适应工作的需要，就主要依靠我中学阶段熟读背诵的那有限的几百首诗词及古文。自然，我入大学后，学术眼界的开扩，解放初在机关工作中掌握的一定马列主义理论知识及一定的分析问题的能力，也是必要的条件。但是如果没有原来所背诵的诗词古文的基础，以及由此基础而造成的阅读古书的能力，我纵有马列主义理论方法，也无法较快地占有在高校讲古典文学所必须掌握的大量的资料。

有一些青年同学、青年同事常常嘲笑我鼓励青年背诵诗词古文是落后的过时的老经验。我却认为这是学习古典诗歌、文学的一举三得的捷径。（一）背诵古典作品，就掌握了古代汉语的常用词汇、常用成语典故以及语法形式，为提高读古书能力创造了必要条件。（二）背诵古典典范作品，实际就掌握了该作品的思想内容、艺术形式的活的典范。作家的思想感情、个性、艺术成就就活在我们心中。而且可以随着我们生活体验和书本知识的增长而逐渐加深对这些典范作品的理解。一首优秀诗词在心里好象一个吸铁石，它能不断吸收与它有关的作品。（三）熟读背诵了一首典范作品，实际就在我们心里树了一个具体的艺术作品的样品和标准。“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心里有了较多的活样品，活标准，自然就提高我们鉴赏批评其他诗词古文作品的 ability。这不是“一举三得”吗？

背诵、记忆，不是我们学习的目的，但至今不失为学习古典诗歌、古典文学的必要方法手段。也有人说，今天搞研究，知识资料堆积成山，必须利用计算机、电脑，才能占有和利用它。我以为电子计算机、电脑，替我们编索引，搞统计，管理出纳图书，从卷帙浩繁的典籍中探寻某些具体材料，甚至比较古书版本的某些异同等等，将来有可能成为我们研究工作的好助手。但是，真正理解、欣赏作品；发现和分析问题；处理资料，综合归纳，得出科学结论，还是得靠我们自己。诗词古文，戏曲小说，都是人创作的，创作出来也是供人阅读的。文学是人学，不是机器学。机器可以作助手，助手不能代替主人。

研究古典诗词，文学，最主要的是要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我们要坚决相信，历史是发展着的，是有它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的。文学是意识形态，文学又是语言的艺术。从意识形态说，它必然受经济、政治、宗教的制约和影响。从语言发展的规律说，它又是不因意识形态、经济基础的变革而消失的。从春秋战国到今天，社会经济形态已几经变革，统治的王朝更是变更了许多朝代，但先秦文学无论是诗经、楚辞，或是左传、国策、论语、老子、孟子、庄子，仍然是文学史上的光辉典范。“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依然是最优美的语言。我们要相信那些优美的典范的诗词古文，可以凭着它自己本身的动人力量，“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足以自传于后。”它不仅会成为后代作家们学习的典范，而且它的思想，感受，语言，会以变化不定的形式在后代作品里留下多少深浅不同的影响。读过诗经、楚辞、汉乐府民歌的人，自然不难在《古诗十九首》里找到三者影响的不同痕迹。“青青河畔草”，“迢迢牵牛星”两诗中那些叠字形容词，显然就是诗经、楚辞里大量存在的。《文心雕龙·辨骚篇》概括楚辞对后代的影响：“故才高者苑其鸿裁，中巧者猎其艳辞。吟讽者衔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是颇能说明典范作品的多方面影响的。

在文学史、诗歌史上，每一个作家都是在他自己无法选择的既定

历史环境和文学传统条件下开始创作的。不论他如何想摆脱时代传统对他的影响，这种影响还是摆脱不净的。所以高呼“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的陈子昂，也难免要写《上元夜效小庾体》这样的宫体诗。继陈子昂之后，把诗歌革新的口号叫得更响的是李白，“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何等斩钉截铁。但是“熟精文选理”的杜甫却一而再，再而三地用南朝诗人来比喻他的诗风：“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近来海内为长句，汝与山东李白好。何刘沈谢力未工，才兼鲍照愁绝倒。”再加上他自己承认的所受的谢灵运、谢朓的影响，以及仿效江淹《恨赋》的显著事例，可知他这个取得诗体革新伟大成就的诗人，还是向南北朝作家们学习了许多东西的。

老朋友陈贻焮同志说：“诗歌发展有一个‘草色遥看近却无’的问题，远看确有那么回事，拉到鼻子底下看，全貌和趋势就看不出来了。”说得很好，但我想补充两句，研究历史，有时要用望远镜，有时也要用显微镜。从具体诗篇的字句之间，研究同辈诗人或前后代诗人之间的关系，有时也是颇有兴味的。大家都知道卢照邻的《长安古意》和骆宾王的《帝京篇》是题材、诗体、风格极为相似的两首诗，堪称为姊妹篇的，但再细读下面的诗句：

“相顾百龄皆有待，居然万化咸应改。

桂枝芳气已销亡，柏梁高宴今何在？”（骆）

“节物风光不相待，桑田碧海须臾改。

昔时金阶白玉堂，即今惟见青松在！”（卢）

你看两位齐名的作家之间的的确确是既互相学习，又互相竞赛，在紧张的竞赛中，竟照步了对方的韵脚。后来元白之间，皮陆之间的全篇步韵的形式，岂不是在一百六十多年前卢骆之间就已开始萌芽了吗？

但是，学习与竞赛并不限于同辈齐名的朋友之间，学习与竞赛的方式更不限于步韵。试看王勃和王昌龄两位隔辈同宗诗人的两首诗吧：

归舟归骑俨成行，

江南江北互相望。

谁谓波澜才一水，
已觉山川是两乡。——王勃《秋江送别》

流水通波接武冈，
送君不觉有离伤。
青山一道同云雨，
明月何曾是两乡。——王昌龄《送柴侍御》

王昌龄这首送别诗分明是在和老前辈名诗人王勃唱反调。他大意似乎是说：你送朋友，刚刚分手，不过“一水”之隔，就有“两乡”之叹，太不应该。我以为只要同一条流水，同一道青山，同一个明月，就不能说“两乡”了。如果要加两句诗外的潜台词的话，那就是：敬爱的老前辈呀，你送别的时候不该忘记“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呀！的确王昌龄这首诗不过是借流水、青山、明月来说明“天涯若比邻”的友情。既“师其意不师其辞”，又巧妙地借王勃之矛攻王勃之盾。这样既向前辈学习，又和前辈竞赛的态度还是很有趣的。

· 郑 重 启 事 ·

本刊自创刊以来得到了国内同行的大力支持和热情鼓励，很多刊物转载我刊文章，有的还为之评论和推荐，本刊深表谢意。

本刊在1982年第9期已告白广大读者和作者，我们将选择《文史知识》中读者欢迎的栏目，把其中已经发表的文章请作者加以必要的修改，对缺少的题目作些补充和调整，然后分门别类地、有系统地编在一起，陆续为读者提供一批较为系统的文史知识读物。截止今天，我们已编发了《与青年朋友谈治学》、《古代礼制风俗漫谈》、《经书浅谈》、《古典诗词名篇鉴赏集》、《中华人物志》、《古文字学初阶》等六种，即将编发的还有若干种。有鉴于此，我们再次呼吁兄弟出版社注意，未经我刊同意，请不要再汇编我刊文章成书，亦不得将我刊文章收入各种文章汇编之内。

《文史知识》编辑部

沈玉成

从文学角度

看《左传》



《左传》是一部重要的历史著作，同时又是一部成就很高的散文著作。有关这部书的性质和一些文献学上的问题，我在本刊1982年2期曾经做过简单介绍。本文试就《左传》的文学价值提出一些个人的看法。

文学和历史是两种范畴。文学家感情热烈，史学家态度冷静；利用想象进行创造是文学家的权利，如实地记录史实却是史学家的职责。史学家当然会对史实作出选择和组织，但只能有所减省而不允许增加，有所突出而不允许虚构。诗人和小说家遇上考据

家，常常会大伤脑筋，类似于秀才碰着兵，有理说不清。用这种标准来衡量《左传》，同样会立刻出现两个问题：一、书里记录了不少密室的阴谋、闺房的私语、个人的独白，古人就曾经问过：“谁闻而述之耶？”（李元度《天岳山房文钞·钜鹿论》）二、即使是朝会、战争、田猎这些盛大的场合，而且还象《汉书·艺文志》说的有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但是那些放言宏论和末节细事，都是在当时的书写条件下无法记录和不必记录的^①。那么，《左传》中触处可见的这些“言”和“事”，所根据的又是什么？

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中论《左传》时说过：“史家追叙真人真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时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盖与小说、院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记言特其一端。”（第一册166页）这是十分精辟的见解。从简单的生活经验来说，那怕是写自传，追记过去发生过的事情，除了

^① 无论从历史记载还是考古发掘中所见，春秋时期只有简易的书写工具即刀笔简牍。

大轮廓和印象特别深刻的一鳞半爪而外，具体的细节、对话，往往是在模糊、片断的记忆上，依靠逻辑的想象使之鲜明，加以衔接，最终拼成整体。所谓“逻辑”，就是在当时特定的时、地、人的情况下，事情的经过“必然”如此，言谈对答也“必然”如此，主观上并非捏造，客观也会被承认并非捏造。自己追叙自己几年、几十年前的事情尚且如此，史学家追叙别人几十年、几百年前的事情又岂能不如此？因此可以说，上面那些文、史之分，只是理论上的区别，在事实上，这条界线是不可能划得那么清楚的。而且，年代越是久远、原始史料越是不足，史学家“遥体人情”的揣摩就越有活动的余地，也就是说，创作的成分越多。这种创作和文学创作的过程相通而不相同，必须服从于已知的史实，即在已经发生过的时空中人的活动，因而它有点类似于戴着镣铐的舞蹈，很容易吃力不讨好。难，才能可贵，正是在这种束缚限制之下，才更显出了左丘明和司马迁这些大手笔的才能^①。

《左传》是编年体史书，以事件为经，以年代为纬。它的文学性首先体现在叙事上。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总结《左传》的叙事方法，有顺叙、逆叙、类叙、次叙、牵连叙、断续叙等二十种左右，冯李骅《读左卮言》则说有二十八种。这种分法不免于评点气，但可以说明《左传》的叙事方法确实多种多样，而且不拘一格，具有“离合变化，奇正相生”的特色。

关于战争的叙述是《左传》中最为人称道的一部分，特别是几次大规模的战争，如僖公十五年秦晋韩之战、二十八年晋楚城濮之战、三十三年秦晋殽之战、宣公十二年晋楚郟之战、成公十二年齐晋鞌之战、定公四年吴楚柏举之战，都能结构谨严、层次分明，举重若轻，各具面目。和写其他事件一样，写战争也无非是起因、准备、经过、影响，如果出于俗手，常常会把复杂多变的生活写成死板无味的文牍公报。然而作者是高明的，他以全力找出事物的特征，随物赋形，使各次战役的叙述在总体上各不相同；即有局部的相同，也能在同中见异。同样是战争的起因和备战，韩之战正面叙述秦直晋曲，城濮之战

① 《史记》和《汉书》都说《左传》的作者是左丘明，本文沿用这一传统的说法。

通过子玉治兵刚而且暴和芻贾的议论说明楚成王任用统帅的不当，殽之战先叙秦乘晋文公去世的国丧之危，又背信弃义劳师远袭郑国，以蹇叔哭师点题；三种不同的方式都预示了战争的结果。同样是战役的经过，韩之战只叙晋惠公不听庆郑之谏、乘马陷入泥坑被俘一件事；城濮之战绘声绘色，写晋文公胆怯，楚子玉骄盈，两军对阵而楚军败绩；殽之战则根本不费笔墨。同样是战争的余波，要求对被俘的娘家人从宽处理，秦穆夫人携儿女登台作自焚之状，晋文夫人则宛转陈辞；对败军之将，楚成王迫使子玉自杀，秦穆公则引咎自责而不罪孟明。自然，这些情节都是事实，毋庸创造，但是在众多的事实中选择这一些而且着力刻画，如同高明的服装师所作的精心剪裁，就使三次大战（相隔仅仅十八年）的描写都能显得生动而新鲜。

写大战面面俱到而面面不同，写小战则往往取其一面。人们熟悉的“曹刿论战”（僖公十年），用表现曹刿个人的才智、识见写长勺之战，从中反映了作者对百姓的态度和对战术的深刻理解；文公十二年秦晋河曲之战，着重写“駟马爷”赵穿 的骄纵、嫉贤，以势压人，遂致没有取得应有的战果。篇幅虽短，但很精采，借用古人评文的话，可以说“无一懈笔”。

许多研究者都注意到了《左传》中的人物形象。一部编年体的史书不同于小说，可以自由地塑造人物；也不同于纪传体的《史记》，可以集中地描写人物。《左传》在历史事件的发展中展现人物，而人物又以自己的语言、动作、行为显示他在历史事件中的地位和作用，表明历史事件发展的必然逻辑。晋文公重耳是书中最英明的国君形象，从僖公四年开始出场，逃亡，到僖公二十三年又重新露面。作者用评点家所谓“倒叙”、“串叙”的方法，集中叙述了重耳这二十年来的经历。重耳沉着、机智、虚心、目光远大，不象申生善良而迂腐。他在卫国“乞食于野人，野人与之块（土块）”，“稽首受而载之”；在曹国受辱，僖负羁向他致意，他受飧返壁；在楚国对楚成王所作“退避三舍”的不卑不亢的回答；僖公二十四年返国，能容纳行刺过他的寺人披和背叛过他的头须；二十五年伐原以宣扬言而有信；二十八年惩处魏犢、颠颉以严明法纪，最终在城濮击败楚国，称霸中原。——一位贵介公子

在政治风浪中成长为雄才大略的晋侯，用生动的形象描绘代替了枯燥的逻辑叙述，然而又印证了作者“一战而霸，文之教也”（僖公二十七年）这一逻辑结论。象这样人与事、文学与历史的错综关系，细心的读者不难在书中有更多的发现。

文学作品中的细节描写，《左传》中更在在皆是。中国古代典籍中，《左传》应当是最早自觉地运用细节以取得艺术效果的一部著作。滥用细节，象王隐《晋书》或者李延寿《南史》，容易流于琐碎，“其事非要，其言不经”（《史通·烦省》），但《左传》中的细节大多经过筛选，对所记述的事件、人物能起点睛或着色的作用。

〔晋获秦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以归。〕先轸朝，问秦囚。公曰：“夫人请之，吾舍之矣。”先轸怒曰：“武夫力而拘诸原，妇人暂（欺诈）而免诸国，堕军实而长寇讎，亡无日矣！”不顾而唾。

——僖公十三年

〔楚国徐以惧吴。〕楚子次于乾溪，以为之援。雨雪，王皮冠，秦复陶（羽衣），翠被（翠羽披风），豹舄（鞋），鞭以出。仆析父从。右尹子革夕（傍晚进见），王见之，去冠、被，舍鞭，与之语。

——昭公十二年

先轸是一个有政治头脑的人物，而竟在盛怒之下失礼，固然点染了性格中有其爽直粗犷的一面，但更深刻的含义还在批评晋襄公懦弱轻率，一下子丢掉了晋国将士用性命换来的战果。下文写先轸在同年八月迎战狄人，以“匹夫逞志于君而无讨”自责，“免胄入狄师，死焉。狄人归其元（脑袋），面如生”，这样的同情和赞美，就是上文言外之意的补充。而且事情发生在晋文公刚刚死去，读者就会自然联想起：这件事情决不可能发生在晋文公生前，随着晋文公之死，晋国的全盛时代正在消逝。后一个例子如此细致地记叙一个人物的衣饰，在《左传》中仅此一见。楚灵王一生经历极有戏剧性，性格也很复杂，贪婪奢侈而荒唐，有时却又颇富人情味。当时他刚刚攻灭陈、蔡，挥师而下，驻节乾溪，志得意满，突出华丽的服饰和闲暇的姿态，正是为下文子革讽谏以后“馈不食，寝不寐”那种急转直下的思想波动作反衬。

细节描写也并非都是由小明大，以便从中悟出多少深文奥义；有不少场合只是为了在如火如荼的画面上再添几笔色彩，热色可以火上加油，冷色也未始不别有情趣。前者如宣公十二年郟之战，晋师溃败渡河，“舟中之指可掬”，使读者如见其状；文公元年楚太子商臣设计从姑母那里套取内情，愚蠢的女人果然中计，大骂“呼，役夫！宜君王之欲杀女而立职也！”（嚯，贱骨头！难怪君王要宰了你立你的兄弟做太子了！）”使读者如闻其声。后者如鞏之战不慌不忙地插进辟司徒之妻关心君父一小段，郟之战出人意外地插进乐伯射麋一小段，都如同颊上添毫，饶有兴味。

《左传》的作者具有熟练的、驾驭语言的技巧。成公十五年引“君子曰”赞扬《春秋》“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正不妨视为作者本人所追求的语言风格标准，即含蓄而能醒豁，简练而能达意。仍以郟之战为例，晋军败退，“中军下军争舟，舟中之指可掬也”，“宵济，亦终夜有声”，如果写成“中军下军争舟，竞攀舷，先乘者以刀断其指，舟中之指可掬也”，“宵济，无复部伍，军器，亦终夜有声”，也许并不能算拖沓，但《左传》的语言干净而有余味，则是任何读者都可以分辨的。郟之战以后，楚国乘势又攻萧国，天气寒冷，楚王巡视三军，“拊而勉之，三军之士皆如挟纊”，比起又俗又滥的“一股暖流传遍全身”，两千多年前的左丘明无疑是高明得多了。

此外，《左传》中所记载的行人辞令，或典雅，或委婉，或严正，或风趣，是否如刘知几所说“谅非经营草创，出自一时，琢磨润色，独成一手”（《史通·申左》），今天也已无可考索。但从全书文字风格的一致性来看，即使有所依据，也必定经过左丘明的加工和润色。

近几十年来，对古代散文艺术的探讨不象对诗歌艺术那么热烈，对《左传》的研究也不例外。被提出而有待于深入的问题很多，但这已经不是这篇粗疏的短文所能容纳和解决的了。

东林书院和东林党



东林书院是明代晚期一个蜚声士林的讲学中心，东林党是这个时期地主阶级中的一个影响颇大的政治集团。后者因前者而得名，前者亦因后者而益显，它们在明代后期的文化史和政治史上写下了有声有色的篇章。

说起东林书院的历史，首先要提到北宋一位学者杨时。

1 杨时(1053—1135)，字中立，南剑州将乐(今属福建省)人。他在学术思想上以程颐、程颢为师，是二程学说的积极传播者，号称“龟山先生”。南宋初年，他被东南学者推为“程氏正宗”。杨时晚年，优游林泉，以著书讲学为事。因为杨时非常喜爱庐山“东林”景色，所以把他讲学的地方取名为东林书院。这就是东林书院的由来。又因杨时号“龟山”，故时人亦称东林书院为龟山书院。元时，东林书院废为僧舍。

东林书院的复兴，则已是明朝晚年的事情了。明神宗万历二十二年(1594)，当时任吏部文选司郎中的无锡人顾宪成，因在“廷推阁臣”的问题上“忤帝意，削籍归”(《明史·顾宪成传》)。里居后的顾宪成，一面著书，一面讲学。但是，他并没有一个满意的讲学场所。他经常不无焦虑地对他的好友、无锡人高攀龙说：“日月逝矣！百工居肆以成事，吾曹可无讲习之所乎？！”(《顾端文公年谱》)可见他不愿虚掷岁月，还希望在讲学方面做一番事业。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九月，顾宪成怀着崇敬的心情偕伴来到杨时讲学的东林书院旧墟，凭吊四百多年前的宋朝学人，一时心有所感，慨然说道：吾曹讲习之所，其在斯乎！于是他“商诸同志”，筹划修复东林书院。在常州知府欧阳东凤和无锡知县林宰的支持下，修复工作在第二年夏季开始，入秋即告竣工。

东林书院修复后，顾宪成邀请江、浙“同人”，在此聚会“相与讲德论学，雍容一堂”，“一时相传为吴中自古以来未有之盛”（《年谱》）。在首次东林大会上，顾宪成宣布了他所草拟的《东林会约》。《会约》阐明东林书院讲学的宗旨，如“飭四要”、“破二惑”、“崇九益”、“屏九损”，强调“务在躬修实践”（《顾端文公遗书·东林会约》）。

这是东林书院复兴的序幕。此后，顾宪成和高攀龙、钱一本、薛敷教、史孟麟、于孔兼等人讲学其中，顾被人们称为泾阳先生或东林先生。废弃了四百多年的东林书院，这时又变得生气勃勃、书声琅琅了。于是，东林书院逐渐闻名于当世，而从这里传出的讲学声、读书声，竟在晚明的地主阶级政治生活中掀起了一阵阵轩然大波。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2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这是顾宪成在东林书院撰写的一幅对联，足见他主张把努力读书和关心政治结合起来。他说：“当京官不忠心事主，当地方官不注重民生，隐居乡里不关心社会状况，不配称作君子。”因此，顾宪成等人在“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要求改革政治，整顿税收，限制大官绅的势力。这些做法和主张，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当是时，士大夫抱道忤时者，率退处林野，闻风响附，学舍至不能容”（《明史·顾宪成传》）。

由于东林书院的讲学活动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因此，它在复兴以后不久，不仅成了一个著名的讲学中心，而且也成了—一个很有影响的政治舆论中心，为世人所瞩目。拥护者固然不少，忌恨者为数亦多。于是，那些反对东林书院的讲学活动的当朝权贵们，就把顾宪成等人以及和他们有联系的一些人称作“东林党人”而加以打击。“东林党”之称是那些反对顾宪成等人的权贵们加给他们的（见《明史·孙丕扬传》）。

“东林党”的产生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从经济上来看，自明初以来，在长江三角洲一带的少数纺织业部门开始出现某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的因素，新兴的手工业者、商民，则是这种生产关系的代表。东林党的一些中坚人物如顾宪成、高攀龙、缪昌期等，都出身于

这种新兴的工商业者的家庭。这对他们的思想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从政治上来看，张居正改革(1571—1581)，曾经一度使明朝的腐朽统治有所改变。但在万历十年(1582)张居正死后，明神宗恣意玩乐，不理朝政，明朝统治又沿着腐朽的道路滑下去。此时，民族矛盾发展，阶级矛盾激化，致使明代后期出现了千疮百孔的政治局面，也使统治集团进一步分化。这个分化，发端于万历十四年(1586)至万历二十一年(1593)的“国本”之争，激化于万历二十一年的“京察”纠纷。所谓“国本”之争是：神宗皇后无子，王恭妃生子常洛，是为长子；郑贵妃生子常洵，为第三子。按封建礼法，当立常洛为太子。立太子，当时称作立“国本”。但由于神宗宠爱郑贵妃，欲立常洵为太子，故一再拖延册立“国本”之事。内阁大学士王锡爵、沈一贯、方从哲等依违其间，顾允成(顾宪成弟)、钱一本、顾宪成和其他许多人则根据封建礼法争立“国本”，形成了对立的两派。所谓“京察”纠纷是：明朝制度，定期考核官员。考核京官谓之“京察”，考核地方官员谓之“外计”。主持万历二十一年“京察”的吏部尚书孙鑣、吏部考功郎中赵南星锐意澄清吏治，秉公沙汰。不久，赵南星被诬为“专权植党”而削籍为民，孙鑣也被迫辞职。这次“京察”，进一步加深了两派的矛盾。明朝后期的“党争”，就是在这个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而东林党作为“党争”的一方，也就应运而生。

从文化上来看，明代在弘治(1488—1505)以前，讲学之风还不大盛行；到了正德(1506—1521)、嘉靖(1522—1566)之际，情况大变，“士大夫率务讲学为名高”(《明史·儒林传二·钱德洪传》)。张居正当国时，曾一度禁止天下讲学，毁坏各地书院。此后，讲学之风又盛行起来。顾宪成等人正是借着这种传统的讲学风气，一面大讲程朱理学，一面抨击当时朝政。讲学，是他们进行文化斗争的一种形式(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下册)，而这种文化斗争又是和政治斗争结合在一起的。

东林党人以东林书院为基地而进行的一系列政治斗争，历史上称作“东林党议”。

所谓“东林党议”，从时间来看，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一)与